

中国服务业开放对服务就业的影响研究*

李 杨 张鹏举 黄 宁

【摘 要】文章按服务部门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开放现状和服务业就业状况,对 2004~2012 年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按可贸易度和要素密集度将服务部门进行归类,检验了不同类别服务部门开放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看,服务出口对就业影响不显著,而服务进口具有较强的就业替代效应;就服务进口而言,可贸易度高的服务、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影响显著为正,可贸易度低的服务、劳动密集型服务进口影响显著为负。服务业外资流入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增长,反而造成就业减少,负向效应主要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最后,文章建议分部门、分地区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水平,同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保证就业的稳定和增长。

【关键词】服务业开放 就业 可贸易度 要素密集度

【作 者】李 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副研究员;张鹏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黄 宁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一、研究背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使服务业的重要性迅速凸显。服务业开始承载起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两个重担。2008~2014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 41.5%下降到 35.8%,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 41.8%上升到 48.2%,经济结构加速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2011 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35.7%)超过第一产业(34.8%)和第二产业(29.5%),2013 年进一步提升到 38.5%。在国际层面,中国服务业面临扩大开放的压力。无论是中国提出申请但仍未被接纳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还是正在进行的中美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服务业开放都是关键。与此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服务业开放推动国内调结构、促改革的进程,上海、天津等自由贸易试验区

*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提供模式比较研究的中国服务业开放策略”(编号:15YJA790035)的阶段性成果。

的建设均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在此背景下,服务业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其关联渠道在于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就业增长两大问题。换言之,服务业开放的路径选择和政策配套,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多是从服务贸易就业效应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这两个方面来探讨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在服务贸易就业效应方面,Armah(1994)就国际贸易对第三产业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贸易可以促进第三产业各行业吸纳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优化就业结构。Mitra(2009)利用印度的数据研究发现,虽然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与服务业就业增长同时存在,但贸易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周申、廖伟兵(2006)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研究发现,1997~2000年服务出口就业促进效应和服务进口就业替代效应呈下降趋势,2001~2004年开始稳步上升,总体上,服务贸易净就业效应较小。赵成柏(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进出口与中国就业数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均对就业人数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服务进口促进效应小于出口促进效应。吕义军、李秉强(2010)研究发现,出口导向率和工资水平与服务业总体就业数量负相关,进口渗透率和产出与总体就业数量呈正相关。蒙英华、黄宁(2010)的研究结论是,长期而言,生产者服务进口对服务业就业具有正向影响;短期而言,这种促进效应依然存在,但效应较小。范爱军、李菲菲(2011)的研究结论是,长期来看,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均对就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服务进口的拉动效应要高于出口的拉动效应。

在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方面,薛敬孝、韩燕(2006)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能提高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整体就业效应为负。刘志中(2011)研究发现,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每提升1%,可使服务业就业比重提升0.244%。陈果、陈汉林(2014)研究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就业数量产生了微弱的挤出效应,但对就业质量提升起到正向作用。张志明、崔日明(2014)认为,总体而言,服务进口对中国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服务出口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无论是服务贸易就业效应还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在数据整理和样本数据的来源方面,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服务贸易总额和服务业就业总数,没有根据不同服务部门的特点进行分类分析,相关因果分析也没有依据中国各服务部门的实际开放水平而展开。同时,由于受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现有文献鲜有运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对服务业就业效益进行研究。现有文献运用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验证服务业开放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关系,且所选用的企业是工业企业,不是服务业企业,目前尚没有服务业企业数据库。虽然蔡宏波等(2014a、2014b)根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从企业层面研究了服务进口与就业性别歧视、服务进口与工资差距等相对微观的问题,但只是1年的数据,没有做面板分析。由于受数据来源的限制,且研究对象为就业数量这一相对宏观的问题,本文在借鉴现有文献相关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的基础上,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1)在分析中国服务业开放和就业水平的基础上,采用更细致的服务部

门数据,根据各服务部门的实际开放水平来解释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种贸易模式对各服务部门就业数量的不同影响效益;(2)就各服务部门而言,分别按照可贸易度和要素密集度将其划分为可贸易度高、可贸易度低的服务部门,以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类型的服务部门在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对服务业就业所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业开放与就业现状分析

(一) 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现状

1. 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较低

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整体水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一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做出的具体承诺,这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二是中国实际服务贸易壁垒,体现为中国制定和实施的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根据《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国对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分类的十二大类服务部门中的9个部门做出了开放承诺,对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以及健康与社会服务和其他服务没有做出承诺。从约束承诺深度看,中国市场准入的部门覆盖率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较低(盛斌,2002)。根据OECD通过对各国实际服务贸易壁垒加权打分得到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2014年中国几乎在所有服务部门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都远高于八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的平均值,也高于金砖国家的平均值。因此,总体而言,中国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

2. 不同服务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水平差异较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估计,以商业存在(模式三)实现的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55%~60%,是服务贸易中最重要的提供模式^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商业存在直接相关,是服务业对外开放最重要的领域。中国在不同服务部门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根据OECD的“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中国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和商务服务等部门的开放水平较高,但在金融服务、通信、运输和传媒部门存在严格的限制(见表1)。由于部门间开放水平的严重失衡,中国服务业外资流入分布集中度极高。2004年以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和商务服务4个服务部门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为70%以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必然会对服务业就业产生影响,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①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包括四类:模式一为跨境交付,指从一个成员境内向另一成员境内提供服务;模式二为境外消费,指一个成员的消费者到另一成员境内消费服务;模式三为商业存在,指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模式四为自然人移动,指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

表 1 2013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

行业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OECD	中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整体	0.089	0.023	0.045	0.061	0.052	0.135	0.068	0.418	0.264	0.101	0.181	0.055
服务业	0.094	0.022	0.033	0.050	0.077	0.141	0.085	0.484	0.340	0.118	0.255	0.101
批发零售业	0	0	0	0.023	0.001	0	0.022	0.256	0.238	0.025	0.050	0.010
运输业	0.550	0.200	0.150	0.114	0.275	0.508	0.218	0.642	0.179	0.275	0.350	0.193
住宿餐饮业	0	0	0	0.023	0	0	0.021	0.170	0	0.025	0.100	0.110
传媒业	0.250	0.025	0.048	0.248	0.200	0.563	0.163	1	0.395	0.550	0.350	0.298
通信业	0.110	0	0	0.023	0.265	0.325	0.089	0.750	0.175	0.025	0.100	0.010
金融服务业	0.042	0.005	0.054	0.024	0	0.050	0.035	0.513	0.320	0.108	0.432	0.052
商务服务业	0	0	0.003	0.023	0	0	0.067	0.388	0.563	0.025	0.175	0.260
房地产业	0	0	0	0	0.100	0	0.164	0.325	1	0.025	0.333	0.060
建筑业	0	0	0	0.023	0	0	0.020	0.345	0.150	0.025	0.050	0.010

注：根据 OECD 的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3. 服务贸易存在严重逆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通过跨境交付(模式一)实现的服务贸易额在全球整体服务贸易中的占比约为 25%~30%。由于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的限制,当前能普遍获得的服务贸易数据主要是跨境交付数据。根据统计,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从 2004 年的 95 亿美元扩大到 2014 年的 1 980 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为低下,跨境交付模式下服务业开放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将更多地通过进口而不是出口实现。由于不同服务部门实现跨境交付的难易程度不同。例如,信息技术服务比房地产服务更容易完成跨境交付,跨境交付模式下,容易实现贸易的服务部门对外开放产生的就业效应更值得关注。鉴于此,下文实证部分将根据服务部门的可贸易度进行分类分析。

(二) 中国服务业就业现状分析

1. 中国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加

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总体就业数量变化并不显著,2001~2013 年仅从 7.3 亿增加到 7.7 亿,但三次产业就业此消彼长的态势非常明显。第一产业吸纳就业数量从 3.64 亿下降到 2.42 亿,年均下降 3.35%;第二产业吸纳就业量从 1.62 亿增加到 2.32 亿,年均增长 3.01%;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吸纳就业量则从 2.02 亿增长到 2.96 亿,年均增速达到 3.26%。从三次产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看,这种变化更加明显。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 50%减少到 31.4%,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从 22.3%提高到 30.1%,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从 27.7%提高到 38.5%。这种变化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融入全球化及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进行:一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造成第一产业就业数量急剧减少。二是迅速增长的贸易与投资等因素拉动制造业发展,吸纳了转移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社会对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进而带动了服务

业就业快速提升。

2. 服务业就业中传统服务业仍占据主导地位

从服务业就业行业结构看,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服务行业。2013 年中国吸纳就业最多的前 6 个服务行业分别是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共占服务业整体吸纳就业的 75%以上。除金融业外,其他 5 个服务部门基本为传统服务业。由于传统服务业发展空间相对有限,其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2003~2013 年,这些行业在服务业整体吸纳就业中的占比大多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从 10.8%下降到 9.8%,教育服务从 24.5%下降到 19.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从 19.9%下降到 18.2%(见表 2)。

表 2 各服务行业在服务业整体吸纳就业中的占比 %

行 业	年 份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批发和零售业	10.7	9.0	8.1	7.8	8.9	10.4
运输、仓储、邮政	10.8	10.2	10.0	9.5	9.1	9.8
住宿和餐饮业	2.9	3.0	3.0	3.0	3.3	3.5
信息传输、信息技术	2.0	2.2	2.4	2.6	2.9	3.8
金融	6.0	6.0	6.2	6.7	6.9	6.3
房地产	2.0	2.4	2.7	2.9	3.4	4.4
租赁和商务服务	3.1	3.6	4.0	4.3	3.9	4.9
科研和技术服务	3.8	3.8	3.9	4.1	4.1	4.5
水利、环境等	2.9	3.0	3.1	3.1	3.2	3.0
居民服务	0.9	0.9	0.9	0.9	0.8	0.8
教育	24.5	24.7	24.4	23.2	22.2	19.6
卫生和社会工作	8.3	8.5	8.7	8.9	9.3	9.0
文化体育娱乐业	2.2	2.0	2.0	1.9	1.9	1.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19.9	20.6	20.7	20.9	20.1	18.2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整理。

未来中国服务业扩大就业的潜力主要在于保持高速增长的现代服务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专业知识技能要求普遍较高,也更容易实现跨境交付。实际上,现代服务业与可贸易度较高的服务部门及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从未来增长的角度观察中国服务业开放的就业效应时,尤其需要关注可贸易度较高的服务部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

三、中国服务业开放对服务业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

在借鉴魏君英、张明如(2013)有关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就业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基

3. 现代服务业是中国服务业就业的新增长点

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整体就业中的贡献虽然还没有占据主要地位,但却是 10 年来就业的主要增长点。例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在服务业整体就业中的比重从 2003 年的 2%提升到 2013 年的 3.8%,金融业占比从 6%增加到 6.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从 3.1%提高到 4.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从 3.8%提升至 4.5%。这意味着,

基础上,本文引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并构建解释服务业就业数量的计量模型:

$$\ln L_{it} = \eta_0 + \eta_1 W_{it} + \eta_2 \ln Q_{it} + \eta_3 \ln EX_{it} + \eta_4 \ln IM_{it} + \eta_5 \ln FDI_{it} + \eta_6 \ln K_{it} + \mu_{it}$$

其中,下标 i 表示服务细分部门, t 表示时间; L 表示就业数量; W 表示实际工资水平; Q 表示部门产出,取值为各部门实际增加值; EX 表示出口导向率,取值为部门出口额除以部门增加值; IM 表示部门进口渗透率,取值为部门进口额除以部门增加值; FDI 表示各服务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取值为各部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除以部门增加值; K 为资本存量; $\eta_0 \sim \eta_6$ 为待估参数; μ_{it} 表示误差项。

待估计量模型的变量中,就业数量(L)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由于2002年后不再统计各行业年末从业人数,因此以各行业城镇单位年末就业人数作为替代。实际工资水平(W)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类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名义工资,用1990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获得各行业平均实际工资。实际总产出(Q)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类服务行业名义增加值,用1990年为基期的各行业增加值指数进行平减,获得各行业实际增加值。服务进口额与出口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和WTO服务贸易数据库,并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民币对美元年均汇率进行单位转换。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均汇率进行单位转换。关于资本存量(K)数据的获取,本文借鉴了崔日明、张志明(2013)使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 $K_{it} = I_{it} + (1 - \sigma) \times K_{i(t-1)}$ 。其中, K_{it} 为 i 部门在 t 年的实际资本存量。 I_{it} 为 i 部门在 t 年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 σ 为资本年均折旧率,本文取中国服务业核算中常用的4%(原毅军等,2009)。各部门资本存量的初始值,按照本文采用样本的初始年份即 K_{i2004} 作为初始值,计算公式为: $K_{i2004} = I_{i2004} / (r_i + \sigma)$ 。其中 K_{i2004} 表示各部门在2004年的实际资本存量; I_{i2004} 表示各部门2004年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 r_i 为2004~2012年的部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实际增速; σ 为资本年均折旧率,同样取为4%;此外,各服务部门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按照以199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各部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样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从2004年开始,《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考虑到数据的有效性,本文的样本数据年份只能从2004年开始,再加上可获取的分服务部门增加值数据仅能更新到2012年,同时受限于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中的服务类别数目,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取样时间只能为2004~2012年,取样部门为9个服务部门。这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类似,如张志明、崔日明(2014)采用2004~2010年共7年9个服务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吕义军、李秉强(2010)采用1997~2007年的数据,在具体服务部门数据选取时进行了大量替代选择;陈健、余翠萍(2014)通过不同分拆和组合,选择了1998~2012年共15年6个服务部门的数据。

(二) 数据处理说明

1. 服务部门与服务贸易的分类对应

由于服务贸易统计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关于服务部门的划分存在差异,本文

表 3 服务部门与服务贸易分类对应表

服务部门	服务贸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运输
住宿与餐饮	旅游
金融	金融、保险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通信、计算机和信息
房地产	建筑
科学研究和技术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个人、文化和娱乐
租赁和商务	咨询;广告、宣传;其他商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其他部门未包含的政府服务贸易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对服务贸易的分类标准和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的分类标准,并参照国内相关研究,将服务贸易与服务部门进行了分类对应(见表 3),除表 3 中涉及的 9 个部门外,“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

社会工作”、“国际组织”6 个服务部门没有对应的服务贸易统计数值,因而无法纳入本实证分析的样本中。

2. 按照可贸易度对服务部门进行划分

“可贸易度”最早源于古典经济学关于“最终产品可贸易,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可贸易”的假定。后来国际经济学以此发展出“贸易品—非贸易品”的分析框架,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扩展成分产业部门的可贸易性问题。21 世纪后,服务外包的迅速兴起引起不少发达国家对本国就业流失的忧虑,特别是服务部门本身的技能密集性和高工资特点更加剧了这种担忧(Jensen 等,2008)。服务贸易相关研究中,开始出现关于不同服务部门“可贸易度”问题的探讨,进而在可贸易度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贸易潜力和相关就业效应(Jensen 等,2010)。显然,可贸易度越高的服务部门,越容易实现跨境服务提供,也越容易通过贸易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本文将国外学者已经测算出的发达经济体各细分服务部门可贸易度(Sáez 等,2015)对应到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下的各细分服务部门中,通过进一步整理归类,将中国各大类服务部门分为“可贸易度较高”、“可贸易度较低”和“不可贸易”三类。由于在实际分析中,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类与后两类之间,因而本文的实证将后两类合并为“可贸易度较低”类。这样,“可贸易度较高”的服务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及“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6 个部门;“可贸易度较低”的服务部门包括“房地产”、“住宿和餐饮服务”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3 个部门。

3. 按照要素密集度对服务部门进行划分

各服务部门不同的要素密集度也会影响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按照制造业要素密集部门的划分方法,可以将服务业各部门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三类。劳动密集型行业指生产支出中工资支出占比较大的行业,以劳动力工资与设备折旧占生产成本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资本密集型行业指单位劳动力对应的固定资本较多的行业,以行业人均固定资产占有率作为衡量标准;知识密集型行业指对于劳动

力专业知识技能要求较高的行业,以中高级技术人员占全行业劳动力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参考邹琪、田露月(2010)和李夏玲、田泽永(2014)关于服务业要素密集部门的划分方法,本文将9个服务部门归为三类。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包含“住宿和餐饮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房地产”;“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及“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5个部门。可见,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外,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与可贸易度较高的服务部门完全一致,所涵盖的均是现代服务业。

(三) 实证分析

1. 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总体上服务出口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服务出口发展水平较低,还不足以对就业数量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虽然服务进口对国内服务业就业产生了较强的替代效应,但不同类型服务的进口所产生的效应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资本密集型服务进口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对就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密集型服务进口对就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1)资本密集型服务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中有很多中间投入服务,这些服务的进口会提高下游服务产业的竞争力,促使其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例如,商务服务内部细分产业之间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性,Douglas

表4 服务业就业数量的 OLS 估计结果

变 量	服务业整体	按要素密集度分类			按可贸易度分类	
		资本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可贸易度较高	可贸易度较低
进口渗透率	-304653* (178061)	931160*** (287206)	258122** (34547)	-1.291e+06*** (418172)	405407*** (75425)	-2.225e+06*** (364330)
外商直接投资	-225044*** (38980)	-767574** (318879)	-52905 (86722)	-117993* (66116)	46266*** (176506)	-439729*** (132890)
实际工资	41.23*** (13.93)	-127.80*** (47.31)	75.02*** (9.136)	-656.30 (411.60)	-38.25*** (12.20)	622.40*** (165.10)
部门产出	6.48e-06** (2.74e-06)	2.26e-05** (9.83e-06)	5.71e-06*** (8.58e-07)	2.29e-05 (4.09e-05)	1.44e-05*** (1.44e-06)	-0.0001*** (1.62e-05)
出口导向率	-109907 (620109)	-4.889e+06 (4.528e+06)	189900 (323689)	1.621e+06 (1.092e+06)	-2.368e+06*** (636807)	-639208 (2.204e+06)
资本存量	-3.39e-08 (3.24e-08)	-6.92e-08 (1.22e-07)	-1.15e-06*** (1.10e-07)	6.41e-06*** (1.79e-06)	1.34e-07** (5.55e-08)	8.65e-07*** (1.73e-07)
常数	544237 (846029)	452629 (2.080e+06)	1.432e+06*** (408414)	951888 (870687)	5.004e+06*** (741929)	1.978e+06 (1.705e+06)
观测值	79	18	45	16	54	25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p<0.1,**p<0.05,***p<0.01。

(2012)曾指出,进口商务服务中间品可以帮助国内生产的商务服务最终产品适应出口市场。

(2)劳动密集型服务进口对国内同类型服务产生较强的替代作用。例如,住宿和餐饮行业对应的主要是旅游服务,虽然国内旅游和境外旅游之间存在异质性,但不可否认境外旅游的便利化会对国内旅游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由于可贸易度较高的服务部门与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高度一致,可贸易度较高的服务进口对国内服务业就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可贸易度较低的服务进口对国内服务业就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2.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

表 4 的估计结果表明,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最可能的原因是:近 10 年来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部门,2013 年这两个服务部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391.60 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33.30%,占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58.07%。房地产业劳动力密集度较低因而不会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体上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中国本土劳动力素质刚开始往往达不到要求,因而对外籍人士的需求相对较多,替代了国内部分就业。总体看,近 10 年来中国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高度集中,外商直接投资本应通过绿地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拉动作用未能有效实现,反而由于加剧竞争等因素造成就业挤出。

从不同类型的服务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就业效应,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外资流入不仅没有带来就业创造,反而因行业生产率的提升造成就业减少;住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外资流入一方面造成国内私人投资挤出,另一方面加剧了原本就很激烈的行业内竞争,导致就业减少;实际上,以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和技术服务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在总体服务业就业的占比从 2003 年的 6.9% 提升至 2013 年的 9.4%,但一方面由于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由于提升了行业内部关联企业的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行业的就业人数,因此,外资流入的总体就业效应不明显;不仅如此,金融服务、电信服务等服务部门开放度相对较低,也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开放就业效应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近 10 年来,中国服务出口对服务业就业影响不显著;服务进口对服务业就业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具体来看,可贸易度高的服务进口、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可贸易度低的服务进口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进口对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服务业直接利用外资未能带来国内服务业明显的就业增长,反而造成就业减少,负向就业效应主要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因此,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不能得出绝对的“积极”或“消极”的结论,而要

基于不同服务提供模式、不同服务部门的可贸易度和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服务行业发展与就业水平做出具体的判断。虽然服务进口对就业的替代作用较明显,但可贸易度高的服务及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可以通过产业关联对就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开放的服务部门十分有限,导致外资分布过于集中,反而造成更激烈的行业竞争以致就业挤出,电信、金融等关键的生产性服务部门限制水平过高,使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提升作用无法充分发挥,2013 年金融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23.30 亿美元,仅占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1.98%,与国内庞大的金融业规模明显不对称。

在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加速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再次面临足以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当的机遇和挑战,其核心是服务业开放的路径选择,以及开放过程中配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此过程中,确保就业稳定和增长是必须考量的关键因素。根据中国服务业分部门的开放情况和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在服务贸易方面,由于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促进了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可以考虑提高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努力扩大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租赁与商务服务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进口。这些服务的进口可以有效推动关联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效率提升与价值链融入,进而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就业吸纳能力。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总体开放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又牵涉较多的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对于仍在进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劳动密集型服务进口会产生负的就业增长效应,因此需要关注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的就业变动,保障就业稳定增长。(2)在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鉴于电信服务、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服务部门具有较强的正向就业效益,应稳步扩大这些服务部门的外资准入水平。通过有序的外资引入继续扩大竞争、打破垄断,能加快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升投资者的信心,进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拉动就业。(3)在服务业开放谈判方面,鉴于知识密集型服务就业在就业增长中的贡献,以及当前中国知识型人才的缺乏,可以在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外资企业加大对国内人力资源的培训,以适应新增的就业岗位,从而为本地就业做出贡献。(4)在配套政策措施制定方面,可分区域实施差别化的外资引入政策,创造适合当地条件的就业机会。在高技能劳动力较密集的地区,侧重改善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外商投资环境;在中低技能劳动力较密集的地区,侧重改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外商投资环境,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程度。

参考文献:

1. 蔡宏波等(2014a):《服务进口与就业性别歧视——基于中国服务业企业数据的检验》,《经济管理》,第12期。
2. 蔡宏波等(2014b):《服务进口与工资差距——基于中国服务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11期。

3. 陈果、陈汉林(2014):《中国服务业 FDI 对服务业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对外经贸》,第 10 期。
4. 陈健、余翠萍(2014):《中国服务进口技术外溢的就业效应及其就业增长技能偏向性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 11 期。
5. 崔日明、张志明(2013):《服务贸易与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提升——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 10 期。
6. 范爱军、李菲菲(2011):《服务贸易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 1982~2010 年数据的协整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9 期。
7. 李夏玲、田泽永(2014):《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发展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第 13 期。
8. 刘志中(2011):《中国服务业利用 FDI 的就业效应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第 1 期。
9. 吕义军、李秉强(2010):《我国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10. 蒙英华、黄宁(2010):《生产者服务进口对中国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第 2 期。
11. 盛斌(2002):《中国加入 WTO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评估与分析》,《世界经济》,第 8 期。
12. 魏君英、张明如(2013):《服务贸易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广东商学院学报》,第 1 期。
13. 薛敬孝、韩燕(2006):《服务业 FDI 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南开学报》,第 2 期。
14. 原毅军等(2009):《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基于非参数 Malmquist 指数方法的研究》,《中国软科学》,第 1 期。
15. 张志明、崔日明(2014):《服务贸易、服务业 FDI 与中国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财经科学》,第 3 期。
16. 赵成柏(2009):《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 1982~2006 年时序数据的计量检验》,《改革与战略》,第 6 期。
17. 周申、廖伟兵(2006):《服务贸易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经验研究》,《财贸经济》,第 11 期。
18. 邹琪、田露月(2010):《FDI 对中国服务业产业效应的实证分析》,《财经科学》,第 11 期。
19. Armah B.K.(1994), Impact of Trade on Service Sector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for Women and Minoriti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12(1), 67-78.
20. Douglas L.(2012), Policy Prioritie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Jobs. OECD Publishing.
21. Jensen J. and Kletzer L.(2008), "Fear" and Offshoring: The Scope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Imports and Exports of Services.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2. Jensen J. and Kletzer L.(2010), Measuring Tradable Services and the Task Content of Offshorable Services Jobs. in Abraham K.G., et al.(eds), *Labor in the New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9-335.
23. Mitra A.(2009), Impact of Trade on Service Sector Employment in India. Working Paper. No. E/298/2009. 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 University of Delhi Enclave.
24. Sáez S., et al.(2015), Valuing Services in Trade: A Toolkit for Competitiveness Diagnostics. The World Bank.

(责任编辑:朱 犁)